

画集

王木森然



王木森然画集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王森然画集

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

(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十二号)

北京百花印刷厂制版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九九二年七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

王森然（二八九五·八·一八——一九八四·四·四），中国学者。……

——《辞海》一九八九年版

他在特定的历史风云中，被迫重新拿起了画笔。

他在生活的最「高」点，俯视生活。

他以特殊的题材和风格，表现他的人格和画品。

他记录着时代的悲怆。

森然仁弟別正

工
田
是
王
摩
詰

齐白石赠王森然篆联

知
田
詩
鍾
子
期

白石老人齊白



笑擎火把 奔向光明

刘海粟

紫草襟怀，乔松品格；

学人本色，战士风华。

这幅联语是为纪念王森然教授而作。

王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。一九八四年春天去世，终年九十岁。

紫草又名紫云英、红花草，是南方常见的绿肥作物。关山笛有一首小诗，咏叹紫草的献身精神：

她不愿长在沃土温房，素美的繁花专给薄地铺上锦毯；

她以别人的丰收为最大的快乐，不惜粉身碎骨，去哺育不相识的幼苗！

王森然编过《妇女之光》、《文化福音》、《诗园》、《微笑》、《榆林之花》、《塞声》、《姊妹旬刊》、《西北民报·火花》、《教育周刊》、《世界日报·骆驼》、《摸索》、《正报·副刊》、《晨报·副刊》、《庸报·教育副刊》，还有《大公报》、《华北日报》、《京报》、《庸报》、《豫北日报》五种副页《艺术周刊》。他和这些报刊的作者们、读者们大多不相识，但他持过七十年教鞭，和学生们的亲如家人，用紫草为喻，只是取其风采，不可能完全贴切。

王森然追求光明的一生，波澜壮阔。坎坷的道路反而培植了他的毅力，增强了他对父老姐妹真挚的乡土之情。

一八九五年（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）八月十八日，王先生出生于河北古定州东旺村。时值甲午战争败于日本，《马关条约》签字，爱国志士，悲愤填膺。社会生活就像王先生后来描述的那样：

……国力日废，每况愈下，大有亡国在即之虞。达官显贵，不顾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。只知酣歌漏舟之中，不晓厝火已在积薪之下。这种令人窒息的时代，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讲已经十分隔膜，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，是切身感受过的，至今铭刻于记忆深处，岁月的浪花，无法将它们洗去。

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六岁的王森然随家人逃至唐县清虚山，侵略者焚烧村落的火光，无辜同胞倒在血泊里的惨状，使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

恨的种子。

他的父亲海峰公教书行医，不足糊口，农忙时还要从事田间劳动。森然从小除去读书之外，也学会了割草、放牛、点瓜、摘豆、喂猪、放羊。这段磨炼，使他终生保持着农民的淳厚和简朴，而豆棚瓜架下的笑声，柳荫湖荡里的牧歌，到他八十岁之后，又变成他作画灵感的源泉。阅历不能冲淡童心，反刍儿时生活，情深笔肆，以简胜繁，寓华于朴质，别具风采。

十岁时，社会危机益发深重，他的第一首习作，便充满了忧国伤时、同情民间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：

伤哉保阳奈愁何，

街市今年倒卧多！

守分贫民皆饿死，

富家袖手念弥陀！

国耻燃胸，十二岁那年，他借左太冲名句「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」的形式，写下一副春联，表达自己渴望祖国扬眉吐气的胸怀：

振衣帕米尔，

濯足太平洋！

次年海峰公去世，少年王森然饱受族内封建势力的欺凌，决心奋发读书，便去定州城内报考县立高等小学，试题是《词必己出论》，他写下七十六个字，以第一名录取。

闻之礼曰：「勿剿说，勿雷同。」此即词必己出之谓也。若夫人云亦云，拾人牙慧者，此乃儒林之开耻，而非有志者之所为也。故吐词为经，立言为法，著为千古之文章，一一皆自出心裁，噫，此亦伟士也哉！

这所学校校址，在畅春园雪浪斋，传为苏东坡任定县县令时兴建，内有墨石，露出白色波纹般筋脉，置于池中。池称「雪浪盆」，清初曾改为行宫，乾隆时期，添了大量碑刻，使王森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后来他酷爱金石，不能说和这段生活无关。

在校中，他大量阅读章太炎、梁启超、严复等人的著译，民族意识逐渐觉醒；后来又阅孙中山和邹容的文章，回到老家，坚持不磕头拜年。在定州组织「桑梓学社」，参加反对外国传教士的示威游行，并在演说辞中号召：「集四万万同胞为一大众，以抵抗帝国主义！」这在当时，被学校领导视为大逆不道。

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定州，他头一个剪去辫子，鼓动青年拥护孙中山先生，拥护革命。校方立即将他开除还乡。没有辫子在故乡也被视为异类，冷嘲热骂，四面碰壁，他不为所动。

不久，清廷退位，河北反正，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，校方又欢迎他回校，定州成立「统一共和党」，与遗老遗少对立，他被推举为头领。

他的事迹被孙中山先生闻知，一九一二年，孙中山路过定州时，曾经命令列车停车，特地召见了王森然。孙先生勉励他说：「你们要努力去，将来的中国要靠你们的！」

导师的教诲铭记心际，后来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
飞毫驱尽胸中恨，

雨露永垂四海香；

不畏人言笑我狂，

直等锦绣垣墙调奏笙簧！

一九一三年，他考入定州中学堂（定武书院）为了交纳学膳费，只好兼任李村店育英小学教员，年薪一百八十吊钱，十分清苦。因为书教得不错，次岁即升任母校县立高等小学教员，月薪二十元，可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了。

因为家学渊源，他在十七岁时，已经从晚唐诗人那里获得驾驭文字的技巧。下面一绝，秀而不寒，从萧荒中得到大解脱：

孤寺夕阳千万鸦，

断桥流水两三家；

荒村一样经霜树，

半似烟云半似花。

时代风云迫使少年诗人放下短笛，吹起号角。后来他用新诗来呐喊，旧体诗词反而极少写作了。

一九一七年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祭谷钟秀（中山先生秘书）的父亲来到定州，曾到定州中学讲演。王森然是学生会会长，负责接待蔡先生兼任记录。记录发表于《公议》第三卷新年号，后来他为蔡公作传记，此文列为附录。

蔡先生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初次见面，蔡先生便教诲他重视民间文学，要他重视教育工作和社会进步的关系。他终生教书，不肯做官，都和蔡先生伟大人格的感召有关。他搜集河北的民谣、谚语，编成《民歌汇选》，交中华书局出版。工作进行中，多次向蔡先生书面请教，蔡先生有信必复，亲切的长者风度，使他终生赞美。

「五·四」运动中，他在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读书，五月五日，他上街发表演说，写了「拒绝和约签字」、「取消二十一条」、「争回青岛山东主权」、「抗议当局拘捕爱国学生」、「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」等巨幅标语，揭露巴黎和会黑幕。两日后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自天津来保定，在军阀曹锟军警的配合下，宣布禁止学生集会游行。但是一纸空文，岂能扑灭青年们的爱国热情。五月二十日，保定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，在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刘少奇、李富春、李维汉等同志积极支持下，王森然继续组织罢课、罢市。他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，去北京声援学生运动，探望关押在北大三院九百多名学生。

在北大，王森然结识了陈独秀、邓中夏、李大钊、何孟雄、刘半农等著名人物，其中和邓中夏关系最深。

「五·四」运动的胜利，使王森然认识到群众的力量。

一九二一年，他入京看望蔡元培时遇到邓中夏，便表达了保定高师学生会已取得校长同意，要聘邓去保定兼课的愿望。邓决定每周去保定授课四至六个小时。

邓中夏向学生们讲解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李大钊、陈独秀的著作，向学生们推荐了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、《资本论入门》、《社会主义史》。他的威信很高，进步学生在他的启示下，成立了「新教育协进会」、「新文化研究会」、「国语文学研究会」，介绍研究新思潮。王森然被选为会长。他写的《颜习斋的学说》，经邓介绍发表于北京《学林》一卷第四、五两期上。后来，他又随邓去长辛店，义务为工人夜校上课。同时写了一些杂文，经邓修改后，刊载于《猛进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文化论评》等杂志上。

一九二二年十月，王森然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新文化课，甚受学生爱戴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安娥、李培之等向校长请愿，要他去任教，校长只好同意。

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，因他著文揭露军阀曹锟的暴政和欺骗，被说成是「过激党」，督署派人去工人夜校抓他，由于学生强明伦等的帮助，才连夜化装逃到北京。五月二十日《晨报》登出通缉他的消息，经蔡元培、李大钊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胡适等教授掩护，他才辞别鲁迅、常惠、钱玄同和何孟雄，去冀州创办省立第六师范。他大讲科学、民主、自由，反对封建礼教和迷信，向学生们介绍《玩偶之家》、《最后的一课》等名著，甚受学生们的欢迎。

次年元旦，经李大钊、林语堂推荐，他应杜斌丞先生之约，到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学府——榆林中学教书，学生们集会相迎。学生会主席刘志丹在会上朗诵了王森然的新诗《杀！杀！杀！》，从此和志丹情谊深长。

王森然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，创办《榆林之花》等刊物，组成「青年学社」，以白话文为教材，宣扬革命思想。组织演出话剧，没有女演员，便由刘志丹担任女角。他又创办平民学校，让惠济地毯厂的童工有上夜校的机会。教师由刘志丹、曹力如等同学担任，不取报酬。

刘志丹去投考黄埔军校，王森然甚为支持。他说：「中国历史上常讲足食足兵，要想打倒军阀，必须有军队。」

他常应杨虎城将军之请，去杨的寓所讲解《水浒》，介绍苏联革命史，也谈中国革命的形势，使杨很受启迪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驱逐曹锟、吴佩孚。在杜斌丞和王森然的说服下，杨虎城同意担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，出师南下，与冯玉祥呼应。杜、王两先生为杨送行，三人依依难别。一九三〇年，杨任陕西省主席，多次劝王森然出任教育厅长，均被婉言辞谢。杨虎城曾多次到北京看望王森然，西安事变之后，杨被迫「出国考察」，王森然为他饯行，挥泪而别。

翌年，他返北京，在北大听鲁迅讲《中国小说史》和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《苦闷的象征》，受益良多。一九三二年，他为鲁迅作传，对鲁迅思想的分析，有独到见解。

在孙中山先生病危期间，他曾随李泰芬前往铁狮子胡同探望。不久孙先生去世，他写了追悼长诗。灵柩南运时，他任「奉安委员会」委员，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为了写好评论吴昌硕、陈师曾艺术的文章，他拜访了齐白石先生，从此成为忘年交。他写《齐白石先生评传》，载于《中国公论》上。

早在弱冠时期，王森然便爱读中国古代画论，在直隶高师读书时，附中学生王雪涛就经常找他研究石涛、八大、扬州画派诸大家的作品。他摹过倪雲林山水、徐青藤花鸟。他作画虽极认真，但从未将习作示人，只不过从中获得一些妙趣，用以调剂读书写作生涯。他到八十岁，也不曾以画家自居。

三十年代中期，齐白石偶然看到王森然画的《岁朝图》，疑是李苦禅代笔，就纵笔写道：

森然弟不常作画，此幅泼辣兼雅趣如此，若令苦禅见之，当再拜不已。

齐先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怀疑，他未加解释。当时，蔡元培先生送了他二十间房子，也就是他住了半个世纪的「杏岩书屋」。李苦禅在困难中幸得森然先生帮助，并住在他家多年。后来，苦禅向齐先生说明森然作画甚勤，齐先生看了许多画稿，很是兴奋，先后为他题画七十多帧，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。

森然弟画远松过我。（题山水条幅）

人曰森然弟学我，我曰我学森然。（题梅花轴）

工画是王摩诘，知音许钟子期。（赠王联语）

二十年代末，王森然分别担任过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、京华艺专、私立北京美术学院的美术理论和文学课教授。一九三一年他创办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时，曾聘白石老人为名誉教授，聘陈半丁、李苦禅、胡佩衡、寿石工、王青芳、姜妙香等人为教授。自己主讲《中国近代画史》、《中国艺术概论》。可惜，几十万言的讲稿皆在「文革」中毁掉。他还向学生介绍普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，号召艺术为大众服务。培养出很多人才。

一九二五年，王森然在北大附近宴宾公寓下榻，当时赵望云随舅父在皮货行当徒工，工余时间爱在地上画画，被他看到，便向赵的舅父提出要收赵为弟子。舅父欣然同意，让望云拜王森然为师。后来，赵在他的帮助下，尝试以国画写生，描绘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涯，在艺术创作方面取得较高成就，扩大了国画的表现范围。

夏天，他应聘去济南一师教国文，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，支持进步学生李广田等参加「五卅」罢课热潮，因而受到军阀张宗昌的通缉。

一九二六年，他逃到绥远任五族学院教务长兼国文、历史教授，还到一中、一师职业专门学校兼课，每周三十多节，不以为苦。他受《西北民报》报社社长蒋听松聘请，编辑《火花》副刊。王森然接受蔡和森委托，领导学生运动，组织「五卅」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，受到军阀蒋红玉通缉。他被迫逃回北京，任教于北京师范，月薪仅十五元。他在贫苦中积累资料，草成《中学国文教学概要》一书，一年后由梁启超先生作序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这本书对教师要求很高，强调教育者应有高洁的人品，「己不正焉能正人」；同时还要有渊博的学识，对国文及其他学科都应刻苦钻研。指导作文，要阅读课文及课外书籍，也要教好应用文。他反对读死书，主张给青年「一把长利的斧子，一个长明的灯笼。长利的斧子是教他们在荆棘丛里谋生的本领，长明的灯笼是教他们在黑暗里寻光明的出路。」他提出改革师范教育，提高教师素质。主张对低年级学生多启发，指出治学途径，同高年级学生多在一起讨论，培养他们的读书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当时全国无统一教材，他提出循序渐进地编选课文，从叙事文到论辩文，进而达到抒情文，读写并重，合乎语法修辞，便于学生接受。书后还附有详细书目，开列当时能够找得到的各国名著译本，以开阔学生的视野。梁先生在书序中肯定了后辈的劳动，那种提携后进的热忱，读来颇为感人。

蔡元培在南京就任大学院院长后，写信召见王森然，要他拜大家为师，潜心学术研究。一九二八年，他写出论文《明堂制度考》，被国立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录取为研究生，导师是著名学者柯绍忞和陈垣。他还写过小说《露白之死》。这时，他兼任北京市革命图书馆馆长，市政府秘书，负责圆明园公葬「三·一八」被难烈士事宜，筹办中央公园大殿改建为中山纪念馆工作。在当时能做成这些事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他在《大公报》上撰文评论李苦禅、赵望云的艺术成就，还推荐赵到北京师范去教美术。

一九二九年，在蔡元培先生指导下，王森然编辑《世界妇女运动大系》，书稿十三卷，一百二十六万八千字。蔡先生和安娥写了序言。书中介绍了将近百位女杰的生平，评述了巴黎第一届万国妇女代表大会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妇女运动，国际劳动妇女大会，英、美、日、德、奥、匈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埃及、朝鲜、土耳其、墨西哥、澳大利亚、南美洲、南洋群岛、北欧等地妇女运动史略及现状，资料丰富。对苏联的男女平等，中国妇运的发生和发展，均有专章论及。也谈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对妇运的影响。蔡先生亲笔写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，还为他预支稿费、解决生活困难，真是关怀备至。「一·二八」淞沪战役，商务印书馆被炸，据闻此稿毁于炮火。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此稿前六卷尚在人间的信息，王森然将残稿赠给全国妇联，目前正在整理，即将问世。

一九三〇年，他将一九二七年以来所写论文结集为《文学新论》一书，交上海光华书局出版。此书对社会现实的解剖很锋利。这是「四·一二」大屠杀几个月之后写的：

在十字街头，我们见到一切的奇形怪状的人类，留八字须的政客、背三角皮带的军官、大肚皮的资本家，汗流浹背的工人、泥土沾满了腿肚的农夫，与衣裳褴褛的、一切被资本家吮吸压榨得再不得动弹、再没有生气的被压迫者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听到军阀老爷、达官贵人的威喝声，执政者杀人的枪声，穷人们的啼饥号寒，以及「乱党」与「暴徒」们家族亲友的悲惨呼号声。在那里，可以嗅到刺鼻的官气与资本家的铜臭，更可以闻到血腥气与火药气。

……艺术家能真正的跑到田间或工厂里去的有几个人？能够了解艺术的真意，艺术价值的农人与工人究竟有几人？

作者指出了旧文学家的缺点，呼吁在血的教训面前清醒过来，决不能像往昔那样：

只会讴歌升平，变乱的时候，他们就甘于任人宰割……或者独超世外，悠然高蹈，幽居于清高快悦的艺术之宫，高翔于玲珑神秘的象牙之塔；或者悲哀烦苦，死寂沉沦，为千万骷髅的写真，促青年自杀的传播。社会的一切一切，人群的一切一切，置之不理，漠然不顾。

……（倒不如）将我们心中所宝贵的美丽的大理石偶像完全打破，清除幻想的玩物，斫去神的香艳的桂林，撕去无实际用处的百合花，驱逐玲珑的歌唱美妙的夜莺的未婚妻，将一切往日旧作的诗篇，全都抛入坟墓里，提起笔来至少应当像农夫拿起锄来锄地，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，是一个有实际的目的。

作者指出：「一切很热诚的艺术创造家，都是纯真的革命家。」他希望创作者、欣赏者联合成一个整体，共同求得解放，而说出这些话来，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，决不是沙龙里喝过咖啡之后的空谈。他不掩饰自己的观点：

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，领导社会的先进，建设社会的工程，利用人类对于美的憧憬，唤起人类中间熟眠的同情；由它所反映的生活，提醒我们的自意识，促成生活的向上；由它所产生的美质美素，提高人类和平健全圆满的环境……社会借文学的调和补其缺陷，文学赖社会

的意义增其价值。社会渐渐进于文艺化，文艺渐渐进于社会化，人类一方面觉醒了心灵，能够追求着物质上的粮食；一方面劳动的灵肉，亦得着精神上的安慰。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以成就人类生活的圆满。

……艺术的平民化，便是把艺术从高贵的宝座上扯下来，使她混入群众的队伍里。那时候的艺术与文学的创作，都不是张口干喊「到民间去」的名词，而是实际上加入农工们的队伍当中，一面是能够胼手胝足的劳动者，一面又是能够创造的艺术创造者。他们写的题材，便是他们切身的的生活。他们的读者，便是他们前后左右的时常在工作闲暇聚首谈心的朋友。

在中国，这是最早提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观点。实现这一过程，自然要经过漫长的道路，才能使人们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，作为热情的宣传家，王森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四大要素：

感动读者的情绪；

源于生活、富于启示的想象；

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；

正确有用的生活经验。

他要求文学（也应当包括艺术）作品具有四种力：

爆发力——喊出亿万贫苦劳动者积压在心头很久，而又喊不出的呼声，深深的拨动欣赏者的心弦；

热力——压抑强制的残害越酷烈，热的能量越能扩散出来；人的强大革命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；

魔力——作者坚固不拔的意志，勇往直前的壮气，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，和一切动人的真实经历，都从文字上跃出……使读者心坎上刻着永不磨灭的痕迹，获得新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成为未来社会的斗士。

传导力——作品将社会生活、作家个性、思想、情绪、传导给读者，引起共鸣。

全书文字鼓动性很强，大声疾呼，要文艺家「巩固我们的阵营，支持我们的革命。」对外国文学也用一定篇幅，作了分析。论巴尔扎克一节，文学性颇为突出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。

今天，这本书仍具有文献价值、史料价值，只要细读沉思，还可以获得一些精神养料。

一九三〇年，王森然研究生毕业，柯凤孙、陈援庵二先生对他作了一番鼓励。他就任河北大学国文教授及绥远通志馆编纂。

出版《印度革命与甘地》一书，分上中下三编，约三十万言。书中首先叙述了印度革命爆发的原因，追溯到十六世纪英人组织东印度公司的社会状态，以及近年印度劳动阶级逐渐觉醒的过程；描述甘地的生平、思想、生活与著作。这是我国学者为印度革命家、思想家撰写的第一本评传，具有拓荒的意义。在序言中，他言道：

在二十世纪前半，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人物，一是苏俄的列宁，二为印度的甘地……列宁是旋乾转坤的伟大人物，而印度的甘地呢，虽没有实际的政治势力，但是他的潜势力，却足以震动全世界。……

希望甘地一变其以往之无抵抗主义，而为积极的抵抗主义。质言之，就是希望甘地积极地起而推翻印度政府。

同一年，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聘王森然为督学。越岁，任北平蒙藏学院国文教授。

一九三二年，他写的《近代二十家评传》脱稿，因其中有李大钊、陈独秀传记，被认为「内容过激」而找不到出版的地方，只好自费印出。

多年以来，王森然立下宏愿，准备写出近代百家评传，后来抗战爆发，生活困难，奔走衣食，心境欠佳，没有完成。第一卷中的二十家是：王壬秋、吴昌硕、沈寐叟、柯凤孙、廖季平、林琴南、严复、康有为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章炳麟、梁任公、陈独秀、周树人、章士钊、刘师培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郭沫若、李泰芬。每传长者二万五千言，短者五、六千字。先述生平，再征引同时代人及后学所记史料、评论，末附传主著作选辑，注重学术性及资料性。

目前从旧报刊上寻得业已发表尚未集成书的传记，有谭嗣同、蔡元培、黄节、杨云史、丁佛言、陈三立、傅增湘、齐白石、高步瀛、黄侃、钱玄同、黎锦熙、陈宝琛、辜鸿铭、王晋卿、刘半农、张季直、梁鼎芬、徐志摩、吴检斋、易顺鼎、樊樊山等二十二家，现已辑为第二卷。两卷共约七十万字，其中第一卷仍用钱玄同先生一九三三年题签，第二卷请刚去世的「五·四」运动时期北大教师沈迈士题了书题，即将重版。

作者爱憎分明，但又力求客观地把握史实，在选材上多侧重政治生活与学术成就，使人们读过评传，对各家真实面目，有所了解。在他笔下受到歌颂的是革命先驱、爱国志士，受到批判的是落伍于时代潮流的人，但也不漫画化脸谱化。

李大钊烈士被反动军阀残害，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，到处在杀人，抓人，钳制言论，查禁进步书刊。王森然在天津《大公报》上，发表了《李大钊评传》，以悲愤的笔调，崇敬的心情，声泪俱下地痛哭先烈，怒斥军阀，没有过人的胆识，便吐不出这样的文字：

先生一生，勤朴清直，艰苦卓绝，洁身远名，不管时誉，尤不治生产。生时仅可供家食，歿后则一贫若洗，棺槨衣食，皆为友助。对友无论党的异同，均和易平直，表里如一。临事不苟，临财不得，是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者也。先生更未尝自矜风节，其内行诚笃，足式浮靡，美须髯，状貌英肃，人莫敢干以私。砥节砺行，从事革命，民国以来，任何党派中，不数数睹也。……为民国一代之大儒，兼革命青年之导师，绝非饰语。先生实现现代不二见之哲人。

世有非难先生者，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理解社会，世有惨杀先生者，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以断其身。处此黑暗、堕落、恶浊、卑污之世界，非先生谁为指路之明灯哉？

这些话是暗夜宏钟，沙场战鼓。有大悲痛、大希望。只有深刻理解思想家价值的人，对烈士言论发生共鸣的人，才会有这样肺腑之音。

先烈去矣，没有觉悟的人们麻木如故，王森然从史学家立场，发出感叹：「国人不知尊之敬之，而权贵之怒睨其旁，朋党之积怨其后，先生宁以死殉党，以死偿学，不肯屈法以求荣，其忠于主义，勇于任事，以视后已尸窃高位，伺敌人之喜怒，以嫖娼取荣者为何如也。以中国之最大政治家，兼学术思想界之钜子，立遭惨杀而无反映，遂知我中国积弊，莫之能革，正先生之所谓人群死，故哀尔涣靡，荡然无纪，以至于此也，悲夫！」

大钊烈士就义前后，也就是鲁迅从事《彷徨》、《野草》写作的严峻岁月，从大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斗士，看清了敌人的残忍和顽固，报国无门，新的战场尚未开辟，历史的浓云正在密集，狂风暴雨何时到来？一时还难下结论。对大地儿女，历史引为骄傲的先驱，加以祭悼，不仅为

了逝者，自然更是为了唤醒生者。鲁迅的呼声，悲壮沉郁，执着而又愤慨，王森然的话，是鲁迅先生秋夜朗吟的回声，都代表了民族正气。

传记之末，王森然引用蒋梦麟为葬大钊同志的募款原启，表彰了北大校长，不掩人善，闲笔不闲。

王森然用景仰的文笔，写出了谭嗣同甘流热血唤醒同胞，推动改革的壮烈行动，又花了巨大的篇幅来探讨谭先生的学术思想。针对尊孔派教育家强调厚古读经的思想，引用谭先生的话来批判这陈腐观念：

「古而可好，则何必为今之人哉？……」

「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也。二千年来之学，荀学也，皆乡愿也。唯大盗利用乡愿，惟乡愿工媚大盗。」

数年前，王森然请文辉入京校阅他的传记著作，曾对他说：「谭先生献身精神，惊天动地，但以他那样方式去救祖国，是无济于事的。我们敬佩他的大勇，为他作传，有利于唤起后辈的民族自豪感，将来要重新评价。至于引用《仁学》中的几句话，旨在咒骂反动政府的统治者和政客。对始皇功过，可以讨论，荀子学术思想，也不能抹煞。」老人晚年，认识水平更高。他还指出：「我在历史人物传记中有骂人的地方，是在旧社会，万不得已，但是我坚决反对搞影射史学。历史上有许多真实的东西，讨论清楚，便对后人有益，能起到镜子的作用。」

在谭传中写道：「……其论虽至平庸，至疏阔，然彼辈当时连占骚《民约论》之名亦未梦见，而理想多与暗合，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。」又评述了谭嗣同「鼓吹革命，词锋锐不可当」，认为对后来的同盟会、光复会，有积极影响，也是言之有据的。

作传记排比史料容易，传导革命精神很难。王森然重后者，也重视前者。到了九十高龄，对自己要求却更严，他说：「谭嗣同传记的编写史识未高，史料未组织好，层次欠清楚，人物没有放到历史环境中去叙说，他日当再重作。」谦虚的美德，真挚的自我批评，值得我们学习！

时代是舞台，人物是演员，史学家的思想是灯光，一个人物的活动说清楚了，时代风尚、典章制度，都被照射得一目了然。蔡元培传记的写法，是这种想法的成功尝试。

王森然在少年时代，就把蔡元培先生看成革命史、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教育史上罕见的人物。

传记详述蔡先生在清末革命运动中的影响，公正评价了蔡先生对推翻满清肇造民国的贡献外，对他的道德观、学术观、教育观，都有述评，取材翔实。通过传主言行，对民国初年教育制度的变革情况，考订尤谨严，为教育史提供了材料。

民元以后，蔡先生在北大期间，对反袁、「五·四」两大运动均极力支持。蔡先生在政治潮流中，如何用人、办事、立论，通过不同侧面，留下生动剪影。如言及马叙伦先生见袁世凯称帝乃愤而辞职，蔡表彰马为「挂冠教授」；「五·四」时，北大反陈独秀者不少，蔡先生力排众议，用人不疑，豁然大度，终于有助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等等，着墨不多，不加评语，而褒贬之意自明。

蔡先生有几件轶事，因为能展现个性，写来不枝不蔓，情趣盎然。如求偶条件，女须大足，识字，男不娶妾，男死女可再嫁，夫妇不合可离婚五条，婚礼以演说会代闹房。蔡氏科举文卷中用老庄语深得李鸿藻主试赏识等，细小却非赘笔。

王森然作传不为尊者贤者讳。这里打算举两点例证来说明：

柯凤孙先生《新元史》一书，体例宏博，文笔谨严，对旧《元史》补充订正处极多，「古来中国学者著述之精勤不苟，历数十年如一日，此种精神，此种愿力，唯宏伟之柯先生有之也。」学生赞颂导师之后，便引王静安先生说的「不用新法，作成零篇，或作为旧《元史》之校勘增

订本，致《新元史》更待校注。」或讥是书无索引，检阅困难，也有道理。下面，王先生摘李思纯《元史学》一书四千言及陈垣先生评语，简述柯著缺点，可以说是爱吾师更爱真理。

蔡元培传记中，引沃丘仲子《当代名人小传》中评语：「当章王之交，南北渐水火，元培奔走调停，功在隐微。非熊希龄之徒徒猎虚誉者比也。惟不达情伪，易为人欺。文学亦非其所长，……又有《红楼梦索隐》，几不能自圆其说，识者嗤之。」易为人欺是忠厚的表现，姑且不论，红学著作，志在排满，科学水平不高，则是事实，引文指明，也无损于蔡先生吧！

王森然终生对鲁迅仰慕不已，可见当年受教时印象之深。

《周树人先生评传》作于一九三三年，当时鲁迅尚健在。言外之情，甚为感人：

二十一年十一月来平（北京）……先生离平后十五日，即有许德珩、侯外庐等教授被捕事件发生，前后不下百余人，均未释放。先生生平，或将波及，亦云幸矣。……余于民国十四年三月，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国文系，听先生讲《苦闷的象征》。八年之久，未通音讯，著笔至此，不禁神驰也。

传记列鲁迅生平，不过六百字，却用十倍以上篇幅来评论鲁迅的著作和思想，在诸家评传中别具一格。他是以文学家治史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能力较高，对鲁迅先生小说的评论，可以看出他的不凡之处，有些评语，至今仍有科学价值：

鲁迅先生，写其封建势力展开庞大之黑翼，同时显示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，以及中国军阀混战局面之下，农村日近于破产之境地，与家长制度同在的封建势力日渐崩溃，采用不同之形式描绘之。……与一切旧势力作殊死战，表示毫不妥协之精神。其《狂人日记》即一颗猛烈之炸弹也。

先生以慈母心情，投给于被封建势力残害的人群，表示同情之低泣。

谈到鲁迅小说中人物：懒散苟活之孔乙己，因革命牺牲之瑜儿，为生活重担压得麻木不仁的闰土，冒险而又对封建势力屈服的爱姑，带着原始性复仇观念的落后农民阿Q，初读觉其可笑，后来失去笑的勇气而令我们惴惴不安的阿Q，是爱是憎是怜，混成一片，分不清楚。赵七爷、陈士成、四铭、高尔楚，在嘲笑的喜剧中揭示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伪善，动摇和惶恐。又有些挽歌情绪，洒在没落孤独的知识分子吕纬甫、魏连殳身上。他说，先生饱受攻击，永不颓废消沉，一往无前，继续抗斗。

传记作者用几行字写鲁迅先生的生活状态，十分朴素可亲：

先生上课至独早，去至迟。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到席中便饭，玉菽窝头，荞面条子，与人力车夫，卖报童叟，共坐一凳欣然大餐。有时相遇，便点头微笑，暗示来此一试，味至美也。

先生上课时，其铅笔横置右耳上，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，有时畅谈，一小时不动讲义，其笔仍是耳上不动。……下课后余步行至五龙桥，先生口衔纸烟，囚发蓝衫坐人力车过此，微笑点头，其笔仍在耳上也。

以上两段细节描写真切动人，为传记加强了文学性。

王森然看人，比较全面，不以偏概全，也不以个人爱憎来评定是非，力求多方面表现人物内在气质和处境。